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国民统合之路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
构筑视野下的内
蒙古东部蒙旗教育

于逢春◎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

二编·东北边疆卷



国民统合之路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
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

于逢春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于逢春著.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4

ISBN 978 - 7 - 5316 - 6268 - 6

I. ①国… II. ①于… III. ①少数民族教育—教育史—研究—内蒙古—近代 IV. ①G7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6333 号

国民统合之路

——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
Guomin Tonghe Zhilu——

Jindai Zhongguo Minzu Guojia Gouzhu Shiyexiade Neimenggu Dongbu Mengqijiaoyu

于逢春 著

选题策划 丁一平 华 汉

特约编审 吕观仁

责任编辑 华 汉 杨云鹏

封面设计 sddoffice.com

版式设计 王 绘 周 磊

责任校对 李永红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6 - 6268 - 6 定 价 45.00 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www.hljep.com.cn

如需订购图书,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451 - 82529593 8253466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451 - 82529347

如发现盗版图书,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0451 - 82560814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
——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

编委会成员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厉 声

副 主 编：丁一平 于逢春 李大龙

编委会成员：丁一平 马大正 于逢春 王子今
王希隆 厉 声 吕一燃 李大龙
李治亭 李金明 李国强 邢玉林
林荣贵 周伟洲 魏存成

序 言

边疆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就地域层面而言，是指国家毗连边界线、与内地（内陆、内海）相对而言的区域。一般而言，历史上中国的边疆是在秦统一中原、其重心部分形成之后确立的，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相应地，中国的边疆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并与国家和边疆的安危息息相关。

从近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过两次研究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国家边界沿革的考订、边疆民族发展的著述等，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标志。在边疆研究的热潮中，一些朝廷的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近代国际法的领土主权原则，与蚕食我国领土的列强势力相对抗。黄遵宪、曾纪泽等都曾以“万国公法”为武器，在处置国家边界事务中与英、俄列强执理交涉。在边疆研究领域，学者们开始将政治学、法学等与传统的史学、地理学等相互结合，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疆学研究。

第二次研究高潮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在国家与民族危机激发下出现的又一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国际法与政治学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之中，边政学的创立与研究、以现代学术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的全方位研

究，是这次高潮的突出成就；研究内容也从边疆领土主权、历史地理扩展到民族、语言、移民、中外交通等领域。与此同时，边疆考察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也愈益受到重视。

两次研究高潮的实践与成果，实现了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中国史学研究向现代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转变，为中国边疆研究学科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兴未艾。继而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带来边疆研究的三度兴起。此次研究高潮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兴盛于90年代，至今热度不减。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成立，这既是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三度热潮的产物，也进而成为国家边疆研究的前沿引领者。

近30年来，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很多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而且以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特点，成为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的优秀作品，对学科建设和发展、对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已形成了从最初以中国近现代边界研究为主，发展到以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近年，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在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遗产的基础上，已逐步形成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而为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模式。

边疆中心所实施的应用研究，是以当代我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现状为切入点，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紧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国边疆研究不但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轨迹，还应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当代我国边疆现状研究首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我国边疆区域的发展现实，促使中国边

疆现状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新的学科定位：即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现状与历史不可分，现状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历史的现状，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历史的和现状的综合性一体研究。通过对学科布局的适时调整，中国的边疆研究不断取得学科突破和新的学科增长点，进而尽快实现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中国边疆研究的过渡。

短期内，我国在中国边疆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必须明确主旨，并应该有大的突破。在深化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理论研究投入的力度，不断探索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发展的规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努力为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人文发展和变迁构筑理论体系，是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近30年来，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为中国边疆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未来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边疆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化，需要理论层面的支撑。在中国古代历史疆域理论、历代边疆治理理论，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的发展规律、古代边疆民族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以及在近现代陆疆、海疆与边界的理论问题等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构建我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边疆研究学科的发展需要尽快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包括边疆学学科的概念、界定与范畴，学科性质和功能，学科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近年来，国内数所大学以开设边疆学博士点为契机，也在加紧边疆史地学科的构建；一些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先后以“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学科定位建立了相关的学科专业；围绕边疆研究先后出

现的相关学科命名有边疆政治学（边政学）、边疆史地学（边史学）、边防学、边疆安全学（边安学）等。但从学科层面看，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缺乏基本学科框架的规范系统论证。在诸如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及整体构建等方面还需要做更多深入研究；在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尽快拿出较为成熟的成果。同时，应注重学科理论建设与方法论的进一步开拓，在原有的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为主的基础上，扩展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突出边疆研究作为跨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特点与优势，不断加快学科建设步伐。

学术研究与研究成果的出版是并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当组建不久的边疆中心在成果出版方面寻找出路的时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伸出了合作之手。一晃至今，双方精诚合作了20多年。先是以《边疆史地丛书》的形式，自1991年3月开始出版，截至2011年，先后有70余种边疆研究著（译）作面世。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持续有力地推动着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不断发展。如果说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方面成为了学术前沿的引领者，那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则以边疆研究成果的出版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出版社。

在当前我国边疆研究氛围持续高涨的形势下，经边疆中心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共同努力，将以更为严格的科学态度、更为严谨的学风文风，共同出版水平更高的边疆研究著作。双方遂决定以《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的形式，由边疆中心组稿审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由《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近代罕见边疆名著点校及解题》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两部分组成。前者共选出近50种近代以来

面世的我国边疆研究学术著述，在实施点校的基础上，作出导读性与研究性的解题，予以重新出版；后者选择近 50 种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边疆研究的老一代知名学者、中年有为学者、年轻后起学者的著述，汇集出版。可以说，这些著作基本代表了目前我国边疆学研究的水平。

同时，对 1949 年后有较大影响的边疆研究著述又进行了修订出版，特别是将新近的研究成果充实其中，使这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内容更加翔实、完整，更具学术价值。

今天，中国边疆研究已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显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尚属开创之举，一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批评指正。同时，我们也有信心，在目前《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二编近 100 部著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努力开拓进取，组织更多边疆研究的优秀成果，继续出版三编、四编……为我国边疆研究的持续兴盛，为繁荣边疆的历史文化，为今天我国边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库》系国家出版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办大手笔支持我国的出版事业，本《文库》是无法面世的。在此，请允许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主编谨识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课题	(1)
第二节 研究的方法、内容及其构成	(32)
第三节 先行研究的检讨	(41)
第四节 原始史料及关联资料的探讨	(43)
第一章 晚清的边疆民族政策与围绕着东北的国际情势	
——晚清“民族国家”构筑趋势下的东北边疆民族 ...	(45)
引言	(47)
第一节 东北地方民族分布的变容	(48)
第二节 围绕着东北地方的国际情势	(67)
本章小结	(73)
第二章 蒙旗近代教育的肇始	
——1902 年壬寅学制公布—1911 年辛亥革命	(75)
引言	(77)
第一节 晚清政府对蒙旗的国民教育政策	(79)
第二节 晚清政府对蒙旗的国语教育政策	(115)
第三节 蒙古族的民族教育要求与实现	
——以“贡王三学”为中心	(136)
第四节 喇嘛教学塾的形态及其变容	
——以 1902—1931 年内蒙古地方为中心	(151)

本章小结	(164)
第三章 “五族共和” 国民统合装置下的蒙旗政策与蒙旗的 应对	(169)
引言	(171)
第一节 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蒙古地方的动向 (1911 年 10 月—1912 年 3 月)	(172)
第二节 北洋政府对蒙古政策 (1912—1927) ——内蒙古地方三个特别行政区的设置	(175)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蒙古政策 (1928—1931) ——内蒙古地方省制的确立及蒙古族的应对	(178)
第四节 沙俄 (苏联) 及日本势力在内蒙古东部的伸展	(182)
本章小结	(189)
第四章 蒙旗国民教育的深化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1931 年“九一八事变”	(191)
引言	(193)
第一节 民国政府对蒙旗的国民教育政策 ——以鄂伦春族教育为事例	(198)
第二节 民国前期蒙旗的民族教育要求 ——以奉天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为中心	(244)
第三节 民国前期的蒙旗教育实态 (一) ——以嫩江中上游流域的达斡尔族教育为事例	(266)
第四节 民国前期的蒙旗教育实态 (二) ——以黑龙江省立蒙旗初等高等小学校为事例	(280)
本章小结	(294)
结章	(299)
第一节 晚清民初东北蒙旗教育的特质	(299)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国民统合之历程	(302)
第三节 本研究的限界、展望及其今后的课题	(316)
附录：本书征引文献与参考资料	(318)
后记	(334)

序 章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课题

一、研究的目的与对象

1. 研究的目的

(1) 近代中国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生成及民族国家构筑

19 世纪 40 年代以降，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降，在西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优势文化的严厉冲击下，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放下“天朝”心态，逐步接受肇始于西欧继而通行于全世界的国际规则与文物制度，开始以欧美式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样本，探索中国式“民族”（或称“国族”）铸造之路。

何谓民族？迄今为止尚无一个非常明确而完整的概念。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解释倒是颇有见地：

“所谓民族，就是那种欲成为民族的东西。单是隶属于某一国家共同体，并拥有共同的政治制度这一客观事实，尚不足以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这里所存在的充其量不过是人民乃至国家所属成员，而不是‘民族’（nation）。要成为一个民族，国

家所属成员就必须积极地要求这种共同属性，或者作为一种愿望至少要被意识到。换言之，一定集团的成员，作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特定民族，意识到相互之间的共同特性，并多少具有要求守护一体性的愿望，只有这样，才能说这里有‘民族’的存在。”^①

何谓民族主义？这也是一个十分难以定义、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令大家普遍满意的说法的老问题。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力芬（Roger Griffin）勉强地把民族主义界定为：

“一种意识形态，其情绪上的驱力为对某一国族的社群之归属感与服从感。这种意识形态的载体（持有人）把国族当成独特的文化认同体，用以与别的民族有所区别，而把本族置于历史过程特别的位置之上。这一社群（共同体）认同了一连串独一无二的特征，包括来自宪政（建构）的、历史的、地理的、宗教的、语文的、族群的、基因的种种现实。隶属于某一社群的感受会激发情绪，包括对本族的文化与传统之骄傲，这种情绪与政治组合可以挂钩，也可以没有关联（‘文化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如果这一情绪在政治运动的活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民族主义一般会把国族的社群建构为一个‘符合自然要求’的国家（不管是联邦的自主国家、或其部分，甚至邦联的成员国）”。

“这种民族国家的主权握在人民手中，由人民选出，或自封地代表形成政府，在占有一定的领土之下，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由此产生的‘民族国家’只要坚持其立国基础为市民（文明）社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住民获得公民身份赋予之人权，而不管种族的标准，那么民族主义就与自由主义紧密挂钩而产生了‘自由的民族主义’（有时又可以称为‘公民（civic）的民族主义’）”。

^① 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26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

“事实上，一个主观的但‘次要的’民族认同就是‘爱国’（或称‘爱国主义’）。这种主观的感受与族群认同的首要感觉并非同一意思，不过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社会之凝聚与政治之稳定关联重大。无论如何，在后传统（现代）的诸社会中，归属感的落实表现在个人对自己的‘乡土’情绪的眷恋之上（这会导致‘沙文主义’），也表现在对自己同胞无上的拥护之上（这会造成‘民族中心主义’）。其过分之发展或是把他国卑视化或是把他族妖魔化，或是在本国之内对其他社群排斥、歧视。这种恋慕、执著之情所激发的情绪常被滥用”。

“滥用者或是国家的寡头领导（形成了‘官方的民族主义’），或是革命运动的煽动性领袖（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在这种个案中，民族主义会合法化其变态的仇外举动（憎恨外人），或以种族、族群之歧义而歧视对待其他族群（‘种族主义’）。不管是仇外或种族主义都否认了人权的普泛性、寰宇性，而产生了‘非自由派（illiberal）的民族主义’。这会导致内政与外交政策偏向的压迫与扩张，也就是以征服、迫害，甚至歼灭那些被视为外族的、朴拙的、堕落的人群。在这一形式之下，民族主义成为敌视谐和的国际社会之元凶，威胁环球社会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①。

由此可见，民族和国家、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并不存在于所有时期和所有条件下。上述作为政治范畴的“民族”以及作为主张自我的民族主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两大遗产，即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比起自由主义来，显得更为强劲。所以，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并进而波及欧洲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

① Griffin, R. (1999). Nationalism. In R. Eatwell & W. Anthony (Ed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2nd ed.) (pp. 154 ~ 155). London: Pinter. 转引自洪谦德：《民族主义的缘起、议题和理论——最近有关民族主义的英文文献之简介》，载《淡江人文社会学刊》，台北，2003（15）。

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如共同的起源、祖先、语言、历史记忆、血统或种族等，而能自我认知或被他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体。西方民族国家是观念性的，得到了被民族主义神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支持。

韩锦春等认为，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用来表达类似“民族”概念的语词，不下数十种，唯独没有“民”“族”二字连缀并用成词者。^①“民”与“族”二字被连缀使用且作为 nation 意义上的“国族”（民族）在中国广泛流传，则是迟至 19 世纪最后几年之事。1898 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开始通过日文研读西方与日本的民族主义论著。翌年，他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明确地使用了“民族”一词。^②嗣后，一般使用“民族”一词者，已与此前的中国典籍中的“族”“部族”“族类”“种”“种类”“种人”“部”“部人”“民”“民人”“民群”“民种”“类”“华”“华夏”“唐人”等词语瓜葛不多，“而是借自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知识分子拼读‘民’‘族’二字，以对译西文 nation 一词所成的汉语新词。易言之，吾人今日习用之‘民族’一词，实为一翻译名词，也是 19、20 世纪之交，中、西、日等不同文化系统间跨语际（translingual）文化实践的特殊产物”^③。

在“民族”一词的基础上，梁启超于 1901 年发表了《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提出中国国势颓废的根源是由于欧美列强挟其“民族帝国主义”，竭全民族及全国民之全能力以临我，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固不足以为有力之

① 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载《民族研究》，1984（2）。

② 梁启超：《东籍月旦》，收入《梁启超全集》第一册，325～335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③ 沈松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台北，2003（3）。

抵制。所以，中国苟欲图存于生存竞争之大潮，唯有“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① 同年，其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接着，他在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将“中国民族”赋予“国族”的内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梁氏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更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李喜所认为梁启超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人。^②

实际上，“民族”与“民族主义”是相伴而生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生成是因先贤们通过探讨“主权”而催生的。王尔敏认为晚清的王韬、郑观应、黄遵宪、曾纪泽、何启等思想先驱为中国早期民族主义者。^③ 美国学者柯保安（Paul A. Cohen）认为郑观应早在1864年前后便具有了民族主义思想。^④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观念萌芽虽然产生较早，但与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一词本身还是有区别的。故最初并不是由西方的“nationalism”一词直译而来，而是使用中国传统的“种族”“种类”等词来表述，如创立于1895年的强学会，其序云：“西人最严种族，

①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95册（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总第5999页。另，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77。

② 李喜所：《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称谓》，载《今晚报》，2006-01-11。

③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77~19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④ 柯保安：《王韬与中国的早期民族主义》（Wang T'to and Incipient Chinese），载《亚洲学刊》，1967，26（4）。

仇视非类。”^① 成立于1897年的南学会之学长皮锡瑞是这样表述他的种界观念的：“今红种黑种为白人剪灭殆尽。……生理既失，种类遂微。”^②

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丸山真男认为在国民意识到自身是政治上的统一体、并加以要求之前，通常先有一个仅仅是作为自然也可以延续其生存的时代。这时，人类对其世代居住的土地，有一种本能的乡土爱。所谓乡土爱，说到底就是自然之爱、环境之爱。自然之爱也好，环境之爱也罢，是人们对自己之外事物的习惯性依存。这种习惯性依存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展到家族、村庄等，是以自己为中心呈波纹状扩散，其密度与距离成反比。结果，对这些人而言，带有抽象性的国家，同自己的家族、村落相比，其亲近性自然是淡薄的。“因此，在某种情况下，乡土爱慢说是培养民族意识，它反而却是一种桎梏。当此之际，近代的民族主义唯有通过对传统乡土爱的扬弃，才能使自己前进”。显然，政治上的民族意识不一定是一种自然的自发性存在。“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民族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以前所依存的环境或多或少自觉的转换，把自己提高为政治上的民族。通常，促使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国势力，也就是所谓外患”^③。这就是说对近代的中国而言，民族是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先存的文化自觉的转换，把自己提高为政治上的民族的。而促使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瓜分。所以，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以及作为主张自我的民族主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包括全体国民的国家秩序即使相应存在，它也未必自然而然地能在民族中发酵出政治上的一体意识。在内部秩序结构阻止向民族国家政

① 康有为：《不忍杂志汇编二集》卷五，35页，上海，上海书局，民国三年（1914年）刊印。

② 《湘报类纂》乙集，卷下，13页，上海，中华编译印书馆，1902。

③ 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268页，三联书店，2000。